

# 发展激励机制的选择及经验启示

李少斐

(天津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天津 300191)

【内容摘要】发展激励机制的选择是一个关乎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的大问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之前与之后,因党不同时期所处时代条件、境遇不同,对社会主义理解认识不同等原因,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激励机制,这一历史过程既有宝贵经验值得吸取借鉴,也有沉痛教训需要记取和避免。

【关键词】发展机制选择 精神激励 物质激励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1-0016-03

如何选择合适的发展激励机制,有效地调动、激励人民群众的发展积极性,是党执政以来一直在探索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之前与之后,因党不同时期所处时代条件、境遇不同,以及对社会主义理解认识不同等原因,党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激励机制,回顾反思往事,既有宝贵经验值得吸取借鉴,也有惨痛教训需要尽力避免。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侧重精神激励发展机制选择

人民群众要充分发挥其自主性和创造性,离不开一定的发展激励机制。改革开放前后不同的发展结果与党和政府选择了不同发展激励机制有很大关系。虽然建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政治前提,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具体体制在调动人民群众的发展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方面还存在障碍,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有效方式和途径。

总的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选择了侧重依靠政治手段和道德调节,侧重精神激励的发展机制。那时,各行各业大都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来推进业务发展。我们曾倡导全社会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和英雄主义精神,倡导主人翁精神和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倡导“一心为国家”、“不计报酬、不讲名利”的奉献精神,用以培养塑造共产主义一代新人。也曾通过宣传描绘共产主义美好远景以调动和维系人民群众的发展积极性。不可否认,这种侧重精神激励的发展机制曾经极大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积极性,但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日趋发展,精神激励方法被推向了极端,日益打上了唯意志论的印记,其他一些行之有效激励方法,如,“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等也未能很好坚持或未能继续探索完善。

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重新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

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认定为国内主要矛盾,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误判,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抓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革命,来促进生产,同时否定了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手段调动人民发展积极性的合法性。表现于制度机制的选择上,就是逐步形成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在所有制方面片面追求脱离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打击和排斥非公有制。从结果看,这种体制一度曾发挥过的巨大正面作用,但随着历史情境的变迁很快就丧失了活力,甚至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导致生产效率降低,生产力发展不快,人民生活困难。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直到1978年,仅为3645亿元,农村仍有2.5亿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城镇有上千万待业人员。实践证明,以国家集体利益为本位且带有平均主义“大锅饭”色彩的经济体制,不能把个体需要与集体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不利于充分调动和保护个体积极性,不能为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活力,不是一种有效的发展激励机制。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激励机制,与我们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境遇有关,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识,与我们没有能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制约有关系。我们曾把高度集权的按照行政计划配置资源的社会主义模式,视为正宗的社会主义加以固守,确信它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有效地配置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它能给人民群众以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自然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信只要坚持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就能达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尽管那时候我们在理论上也没有否认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动力,但在实践中却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去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还误以为所有制结构越纯越好,公有制的比重越大越好,公有制形式越高

\* 作者简介:李少斐(1965—),男,天津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党的建设等。

级,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也越快,甚至认为依靠先进思想和革命热情,不断推动生产关系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素迅速增加,经济就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超常规、高速度发展。这样就片面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不是把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变革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力量。

我们之所以选择侧重精神激励的发展机制,还与我们党沿袭了战争年代所积累的相关成功经验有关,与沿用旧方式和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思维方式有关,也与当时党对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不熟悉、对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动没有敏锐觉察有关。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背景,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力量的作用给人感受和印象非常深刻,人民群众的主观力量和革命精神似乎不包含利益追求,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似乎也可以脱离物质利益而持久保持,我们甚至担心人民群众关心个人物质利益会带来革命意志衰退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我们注意不到和平建设时期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方式方法应与战争年代有所不同,忽视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侧重物质激励发展机制的选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认识社会主义,从本来意义上复归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深刻汲取了过去忽视人民利益的沉重教训,重新思考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激励机制问题,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提出人民利益是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强调必须努力实现人民利益,否则将导致亡党亡国,并结合现实国情和人民需要,主张在物质利益基础上,重视精神的作用。尽管邓小平也认为“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sup>[1]P337</sup>但他同时也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时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sup>[1]P233</sup>在邓小平看来,“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sup>[2]P89</sup>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必须有机统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行。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了人民群众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合理性,解决了运用经济手段激发人民群众发展积极性的正当性。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后侧重运用“看不见之手”来调动人民的发展积极性,比较符合当前我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状况。

表现于发展激励机制的选择上,就是适当调整所有制结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终于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分配制度,使生产关系更符合我国现实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有利于调动和保护群众积极性。从实践进程看,先是在农村废止人民公社,改革调整农村经济体制,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经济责任制,下放生产经营自主权给农民,然后在

城市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社会主义新体制。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体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

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归因于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摒弃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某些原则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非科学认识,果断废止那些超越我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左倾政策,也归因于邓小平对国际共运史上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他不仅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更看到蕴藏于人民群众中的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需要通过正确的体制才能充分激发出来,才能实际地转化为促进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所以,更加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

## 三、发展激励机制选择的经验与启示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激励机制的选择是一个关乎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的大问题。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一切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活力,而要实现这一点,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发展激励机制的选择是否正确合理,因为,发展激励机制的选择实质上人民利益实现道路和方式的选择。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之所以在探索发展激励机制的方式和人民利益实现的道路选择方面有较大差异,主要是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等重大问题上的理解认识上有较大差异和不同。总结回顾历史,至少应该汲取以下经验启示。

1.必须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从现实社会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通过体制创新激发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经典作家提出了社会发展合力论,认为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因是经济因素,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sup>[3]P741</sup>他们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生产力不是单纯的物,而是人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人作为生产力的主体,是生产力当中最具有决定作用的力量。在这一总前提下,经典作家又提出人的需要和利益是驱使人从事生产劳动的最初动因和目的,是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所谓“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指的就是这一点,昭示我们社会发展的内部驱动力,只能从社会自身中去寻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生产力发展具有适应性,但具体体制对生产力发展又有不适应性,需要通过体制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寻找直接动力。

因此,经济体制问题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重点解决

的问题。它需要不断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最新要求去变革。作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是人们利益关系的制度化形态,也是人们赖以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基础条件,在相当意义上决定人的劳动效率的高低。当它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它的作用是正向的。体制变革的总的目标取向应该是一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能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机制,也就是要逐步形成一套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能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能为各种积极因素的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强有力制度保证的完备成熟体制。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运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激发个人创造力和有效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从制度上整合了人们的发展活力,极大地调动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现行体制仍有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从保障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入手,从体现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入手,在充分信任依靠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基础上不断推进经济体制创新,构建发展激励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调动从人民群众发展积极性的问题。

假如我们选择的经济机制是一种既体现高效率又体现公正公平精神,不仅能激活人们追求合理利益的动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公正分配,而且能确实防止贫富两极分化,能保证利益调整和重组时期各社会主体的基本利益,能确保人人都有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权利,能让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体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得到充分发挥,就会焕发出推动政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

2.发展激励机制的选择必须与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发展状况相适应。发展激励机制选择必须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基础,要与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发展状况相适应,不仅要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也要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意志、要求。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状况下,劳动仍是谋生的必要手段,物质需要仍是人们的第一需要,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和行为之源,仍然是人的积极性产生的基础和原动力所在,物质激励仍然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激励手段。正如列宁指出:“国家不仅要进行说服教育,而且要用较好的生活条件来奖励优秀的工作人员。”<sup>[4](P149)]</sup>必须从发展激励机制体制上保障和承认人们合理的物质利益追求,尊重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也认识到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及其满足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强调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社会运行的内在动力源。毛泽东有句名言:“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sup>[5](P563)]</sup>就是说,发展激励机制的选择必须建立在承认人们追求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基点上。

激励的主客体都是人,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有物质与精神需求的现实个人,究竟是侧重物质激励,还是侧重精神激励要根据人的需要的实际情况确定。当然,发展激励机制是个系统。只有单纯的物质激励或是精神激励都是不够的,物质激励不能代替一切,过分夸大物质利益的作用,会使人们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会使社会发展偏离正确方向,有可能导致人民群众精神追求虚化和集体观念弱化,其激励作用最终也会日趋衰减。同样,精神激励也不能代替一切,单靠精神激励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问题,比如,忽视物质利益作用,只注重理性、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甚至靠空想激发群众积极性的做法,不足以长久保持这种积极性。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可以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精神激励,但必须运用得当,作用才能显现,比如,我们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真正内化为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可能较之物质激励更能激发人民群众的发展积极性。所以,必须努力探索两种激励机制,即物质利益激励机制与精神激励机制有机兼容的新思路、新办法,有的放矢地创新发展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是以人为本的,是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的,是兼顾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满足和精神需求满足,只有这样,才足以人民群众的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总之,在发展激励机制的选择上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性和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以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各发展主体的活力为取向,以能否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判断其好坏的标准,以生产力为标准来衡量发展激励机制的适应性,并始终把这一价值取向,具体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行动,贯彻落实在各个领域,尽快建立健全正确协调中央与地方、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发展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马克格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